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日中关系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理事长 小和田恒

编者按：2000年5月16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理事长、前外务省次官、日本前驻俄罗斯及联合国大使小和田恒先生访问北京大学，并向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师生发表了题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日中关系》的演讲，受到与会师生的欢迎。本刊特此将他的英文演讲稿译成中文发表。

首先，我想对邀请我参加今天会议的袁明教授及会议组织者表示诚挚的感谢。能够有机会在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在全中国最受敬仰的高等学府的听众面前进行演讲我感到极为荣幸。

引言

今天访问贵校我感到特别激动，原因有两点：首先，因为我自己也属于学界人士，所以能够在这样一所因其优良传统和很高的学术质量而享誉中国的高等学府作演讲，我感到十分高兴。其次，我非常高兴能够与你们这些中国年轻一代的代表来共同分享我对未来世界状况特别是日中两国在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过程中所能共同扮演的角色的一些个人的思考。

在我从事日本外交工作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过着一种兼顾外交理论和实践的两栖生活。虽然我的主要工作在外务省，但我也把相当大一部分时间花在了学术界。

我曾在东京大学担任教职三十余年，并在哈佛、哥伦比亚和纽约等大学担任过教授。我还想补充一句，现在我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这所大学曾培养出来自中国的几代著名人物，其中包括曾为促进日中友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廖承志先生，我为此而感到骄傲。有鉴于此，此次访问贵校令我兴奋异常。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我非常希望能够与中国的年轻一代进行对话。当前，中国周围的环境在变，中国本身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国自身的变革加上正在变化的世界环境注定要给未来的日中关系以新的推动，赋予其以新的方向。在我看来，要使这种新的推动和方向符合新的现实，关键在于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一代。

心系于此，今天我想谈谈当今世界的状况。我将对在我们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世界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作出分析。接下去，我试图将我的分析与我对未来日本、中国和日中关系的看法联系起来。

国际体系的状况

在我们即将迈入一个新的千年之际，我们在国际社会中所目击的是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10年前，当冷战刚刚结束之时，世界上有许多人便开始谈论“国际新秩序”问题。这种“国际新秩序”宣告，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这一新时代将以更稳定、更持久的和平和以联合国为行动中心为特点。这种希冀是以我们所亲眼目睹的一系列令人目眩的发展变化为基础的，比如说，1990年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还有联合国在柬埔寨所进行的出色的维和行动，这一行动无论就其规模还是成功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一些人甚至开始乐观地谈论起“历史的终结”，好象我们已最终从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法的枷锁中摆脱出来。

但随后所发生的情况却摧毁了这一颇为幼稚的新时代的国际秩序图景。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这种为沉浸于海湾战争胜利气氛中的各国领导人所欢呼和拥抱的“国际新秩序”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种新的思想氛围正在出现，声称所谓的“国际新秩序”——这甚至都不能被称作是一种“秩序”——既没有任何“新”东西也不具“国际性”正在变成一种时髦。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不正确。两种看法均不成熟，不能以之为框架来理解当前国际体系所正在经历的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全部含义。

我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作为一个体系它正在经历着一场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法律秩序”的传统国际体系的诸多方面由于两种因素的作用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一是苏联集团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消亡的以均势为基础的旧秩序，其二是全球

化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本身上升为体系的首要的构成要素。

自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为标志的近代国际体系诞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秩序一直是以主权国家共存这样一种观念为基础的。这种秩序建立在各国间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两大原则之上。就此而言，近代国际体系可以称作是一种建立在下述观念之上的秩序，即共存于一个多极结构中的主权国家之间保持均衡。这种架构的最终形式便是冷战时代的两极结构。这种通过美苏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之间的“恐怖均衡”来维持的国际秩序的消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向好的方面发展的重大变化，因为这一变化使我们摆脱了这样一种状况，即我们对安全的最大关注来自于全面核战争的威胁。

冷战的结束清楚地表明，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出现，在这个新的世界当中，原来那种以各主权国家间的均衡为基础的秩序已经不再有效了。

没有人否认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此论题的延伸，有人认为我们即将置身其中的世界秩序也将是一种由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发号施令的单极秩序。这种推断是不成立的。我认为，由于存在我在前面所谈到的两大变化，单极秩序不可能在我们所面对的正在演进当中的新环境中占据支配地位。相反，这种单极秩序的谬见如果产生影响，将会导致秩序出现机能障碍。

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美国治下的和平”曾一度成为游戏规则。在大约仅10年的短暂时期内，体系中的秩序主要由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来维持。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倾向于推行一种我称之为“单边全球主义”的政策。事实上，美国当时是通过单边领导来维持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秩序，从而实现了对国际体系的管理。

然而，权力的扩散带来了新的情况。在

此情况下，要实行“单边全球主义”已不再可能。当前世界之现实是，世界秩序不能由单纯的一极来决定，不管这一极就其相对力量来说有多么地强大。更确切地说，迷信单极秩序谬见的危险是，它会诱使人们去实践那些相对而言也许可以被称之为“全球单边主义”的东西，这在今天似乎正在吸引着某些美国人。然而，这并不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因为它很容易促使一个国家将其按自己单边意象所构想出来的某种秩序在全球范围内强加到并不一定拥有相同意向的其他国家的头上。已经成为新的现实的权力扩散以及基于多元价值判断和多种多样利益的政策观点方面的不同不允许我们实行这种“全球单边主义”。

同时，另一个相对来说更新的因素也正在对体系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这就是，在飞速发展的相互依存现实的背景下国际社会中正在出现的全球化进程。这一新的因素正在给国际关系带来一种全新的面貌。这就是我所认定的导致国际体系发生转变的第二个因素。

1987年10月发生的近乎恐慌的“黑色星期一”和最近发生的亚洲经济危机似乎已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构成了威胁。它们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观念，而且还是一种可以以物质方式给我们以影响的生活的现实。人类活动已变得如此具有全球性，以至于这些活动的后果已经不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通过扫除过去那些使我们分属不同国家的时空差异的限制，正在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凭理智来进行治理的体系。从时间和空间意义上来说，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将整个世界全球化为一个统一的单位。事实上，我们被迫接受这样一种现实，即全球社会的出现已经成为一个我们为国际体系正常运转而不得不考虑的关键

因素。

在传统体系下，我们倾向于将国际关系完全看作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现在，正在不断取得进展的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在新的环境下，单个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要多于那些它们可以独自解决的问题。

目前出现问题的是以威斯特伐利亚法律秩序为基础的管理体系。在那些正在使我们的全球社会发生改变的各种因素的压力下，这一体系正面临危险。许多人承认这一新的现实，但他们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我们正在迈向一种多极秩序。据称，在北美、欧洲、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多个权力中心正在出现。在此情况下，有人认为，只有我们接受那些管理这样一个以各“极”之间的均势为基础的多极框架的游戏规则，世界秩序才能得以维持。我不赞同这种世界观。我承认，在世界不同地区将会有多个主要成员，它们希望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对它们各自区域内的事务施加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将进入一种多极秩序。我坚持认为，国际体系成员的多样性并不导致世界秩序的多极性。

多极秩序作为一种运行体系，其实质是这种秩序只能以多个权力中心间业已建立起来的均衡为基础。也许这样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即在当今世界，各国即将面临一种向以均势原则为基础的多极秩序的旧世界回归的新的诱惑。然而，在当前全球化的世界中，构成这种均衡的等式中的各种因素要复杂得多，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也要高得多，这使我们无法单纯而简单地回归到均势。

事实上，考虑到目前席卷世界的全球化因素，唯一切实可行的体系是一种基于我想称之为“国际协调下的和平”（*pax consortis*）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有效性取决于作为主要成员的大国之间的积极合作。

如果我们试图为巩固21世纪的世界公共秩序而寻求一种建设性的合作框架，那么

给这种框架以基本定位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构建这种“国际协调下的和平”的关键是加强和深化构成这种秩序的基础的那些核心价值。

设想一个完全服务于消极保护世界上某些成员的排他性利益的合作框架并不困难。也许甚至还会存在这样一种诱惑，即把我们将为建立“国际协调下的和平”而付出的努力限定于巩固这样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框架之内。但要使这种秩序真正发挥作用，我们必须促进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的那些包容性利益。

确定这些我们所赞同的基本的核心价值，努力推动之，以表明其符合整个人类的全球利益——为此而共同努力是我们接下去要走的路。要想使这项努力取得成功，核心的一点是，我们应该走包容之路，并保持开放的心灵。我们必须摒弃那种旨在维护某一特定国家的狭隘利益的排他性作法。

在一个“国际协调下的和平”的世界上 日中合作的重要性

如果迄今为止我的论述符合当前国际体系的现实的话，我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日中两国为加强世界公共秩序而展开积极合作对于稳定东亚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极其重要的。

冷战对亚洲地区的影响不如其对欧洲地区的影响大。亚洲的安全环境与欧洲相比有显著的不同。可能除去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之外，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并没有成为大国争霸的主战场。美中和解是在 70 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始于 70 年代末。该地区的国家对卷入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纷争也不感兴趣。它们全力以赴，在战后新日本——一个决心通过和平合作与该地区其他各国共同奋斗的国家——的和平援助下通过发展经济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在这种良好的

环境下，东亚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东亚的经济发展尤其引人瞩目。一些人因而宣布，亚洲将成为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确，东亚已经被认为拥有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的巨大潜力。

从这一总的背景来看，1997 年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是一个重大的倒退。这次威胁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危机看上去也是一次影响亚洲地区稳定的危机。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该地区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中国，以一种合作的精神而采取必要的措施才是如此地重要。

日本作为该地区的一个经济大国，为遏止这场危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本着这种精神，日本对受危机严重影响的国家采取紧急救援行动，同意延长这些国家 800 亿美元债务的偿还期。此时最令人鼓舞的是，中国认识到她作为一个主要东亚伙伴的角色，也采取了相似的态度。

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努力阻止了第二轮货币危机，此举意义重大。中国还提供了许多紧急便利。在我看来，这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中国的领导层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我所称之为“国际协调下的和平”这一框架中的主要成员所肩负的责任，并且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采取了这些援助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先生曾指出，中国所提供的经济援助的数额“对那些面对巨额外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决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国由于认识到她作为亚洲的关键一员而采取的这种合作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最近发生的另一个合作的实例是“东盟+3”财政部长会议为建立和扩大东盟互惠信贷安排以及东盟国家间双边互惠信贷安排和购回安排网络设施而提出的“清迈倡议”。中国、日本和韩国已同意联手加入这一合作。作

为两个拥有最大外汇储备的国家，日本和中国结为伙伴对“清迈倡议”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例子表明，在国际体系的新的演进过程中，国家不再单单是盯住一国的狭隘的国家利益，而是作为负责任的伙伴为东亚更广泛的利益而行动，更普遍地说，是为促进全世界的公益而行动是何等地重要。

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经济问题，而且同样也适用于政治问题。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加强世界公共秩序负有特殊的责任。在这方面，我必须非常坦率地说，中国在安理会中所采取的立场有时达不到我们对中国的高度期待。这十分遗憾。我深信，努力从如何在这一混乱的国际体系中促进世界公共秩序这一观点出发来处理争论中的问题而不是专注于某一争论中的特定问题对中国的有限的和短期的含义，将更有助于维护中国的长远利益。

我所说的这些同样也适用于在东亚一些令我们担心的问题上我们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事实上，在我所想到的这些不安定因素中有许多是产生于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冷战遗产”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不安定因素是一些应由有关各方以和平方式来加以处理的问题。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以及其他科技领域的显著进步却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即不论世界上哪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都会作为实时新闻而马上传遍全球。

在这种情况下，要将这些不安定因素的影响限定于某一国家或地区已几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对地区不安定因素漠不关心，因为它们会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产生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让我来探讨一下朝鲜半岛的情况。朝鲜北南双方的首脑会晤看上去将使朝鲜半岛上的长期对峙走近一个重要的

历史的十字路口。这是一个新的良好的发展。正如“佩里报告”所表明的，该地区的三个国家，日本、韩国和美国一直为开启一个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建设性进程而紧密合作。

在此情况下，中国对这一进程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与北朝鲜之间保持多年的关系使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可以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现在急需为缓解北南紧张局势而采取进一步的积极行动。这不仅仅是因为朝鲜半岛可能爆发的灾难可能会危及象日本和中国这样的邻国的安全，而且也是因为这关系到这一地区的世界公共秩序问题。对于这一秩序，日本和中国均负有责任。在此背景下，我们日中两国亟需与有关各方一道，为保证这一问题获得圆满解决而履行我们的职责。

在同样的背景下，我想涉及的另一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仅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在不同的意义上，台湾问题对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整个地区来说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首先让我清楚地表明一下日本关于台湾的立场，以免造成任何误解。在1972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日本在《联合声明》第三节中正式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日本一贯遵循她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所表述的关于台湾地位问题的坚定立场，从文字上和精神上信守她所作出的承诺。在1998年的《日中联合宣言》中，日本再一次确认了她关于一个中国的立场。

然而，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台湾问题的含义却超出了此处所涉及的这一基本的原则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能说日本围绕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利益。个中原因应该说是清

楚的。一方面，台湾距离日本最南端的岛屿仅 160 公里，并且正好位于日本最重要的海上通道的中心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地区的和平与日本的安全问题密切相关。此外，日台之间的（年度）贸易额超过 360 亿美元，目前有 9 万多来自台湾的华人居住在日本，有 1 万 3 千多日本人居住在台湾。从这一视角来看，日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关注台湾海峡的和平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

再者，从维护作为世界公共秩序的一部分的本地区的安全所包含的全球利益这一观点来看，世界的注意力正聚焦于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所可能作出的决策。全世界都在密切注视着未来的发展。来自中国的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声音会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所抱有的信任和信心，其影响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这将被看作是一种与协调秩序的基本前提相抵触的姿态，而中国却是一个对这一秩序负有主要责任的伙伴。

关于台湾问题，我坚信所有有关各方必须共同合作，以寻求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为此，各方坚持只有“一个中国”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该下定决心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而台湾则应该避免采取挑衅性的行动，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日中关系

日中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我们日中两个民族共同成功地创造了我所称之为东亚文明的核心。我们为迈向 21 世纪的日中关系的未来所作的准备应该放在这一长期相互作用的历史背景下来加以评定。

日中两国邦交的完全正常化是在 1972 年。自那以来，两国之间的相互影响一直在以一种超过我们想象的速度不断增长。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日中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对于实现亚洲特别是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紧密合作——不仅在双边关系的层次上，而且也在影响东亚地区的许多问题乃至全球问题上——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切实可行的公共秩序的关键。为实现这一目标，两国拥有共同的责任。为履行此责任，我们日中两国应该努力继续加强我们的双边关系。

作为加强我们双边关系的前提，我想坦率而诚恳地说，我们两个国家中的每一方都必须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克服那些过去的遗产。

在过去，日中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我们对过去的记忆的深刻影响。虽然我坚信我们应该牢记对过去的记忆，但我们也应该可以超越过去，以便为未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奠定稳固的基础。我们需要自觉地作出努力，其重点在于加强相互信赖的双边融洽关系和建立真正为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而共同努力的伙伴关系。从历史上来看，这一直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仍将是我们的未来的命运。

在 1998 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双方发表了《日中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并在关于加强日中之间面向 21 世纪的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中提出了“有关合作领域的 33 项条款”。这些文件的意义也应该放到正在变化的国际体系的环境中加以理解。

这些协议将有助于未来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在这些协议中，双方均认为，两国间合作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加。他们还同意，加强和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双方还重申，日中关系对各自国家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已认识到两国在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所肩负的责任，并表达

了她们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决心。

至于对过去的记忆，我完全理解中国人民的强烈感情，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动曾使中国人民深罹其害。

这类事情永远也不应该再发生了。言及此，我深信，日本永远也不会再度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日本人民对过去表示深深的忏悔，并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以此为基础，他们坚定地承诺走和平之路。严重偏离这一基本方向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出现这样一种发展趋势，那将会马上遭到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反对。

我的坦率印象是，中国有时误解了日本的真实情况。中国官方不时对日本社会的一小部分人的活动提出指责，并坚持把这类事件的发生看作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趋势的初始证据而予以坚决的反对。

我的担心是，这种情况会导致产生这样一种危险，即这将令绝大多数相信新日本是一个和平主义国家的日本人感到不快。我知道，在中国有句话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过，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中国的领导层真的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那么这种担心便只不过是中国人所说的“杞人忧天”。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担心是以夸大的方式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那将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这种政治考虑会使日本的不快感变成一种更为严重的怨恨情绪。同时，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在日本也有一些人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抱有错误的看法。实际情况是，目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正在为克服殖民地化和军事侵略的历史遗产而斗争。现代化是政府执政的合法性的基础，而在此进程中取得成功是中国国家巩固的必要条件。至关重要的是，日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对中国人民的奋斗抱有深切的同情。在我看来，如果我方意识不到这一点，日本人民便等于是完全忽视了我们作为

一个伙伴的责任。

作为对全球性问题负有主要责任的伙伴，日本和中国必须共同努力。两国应该在亚洲和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其方式是向世界表明，这两个亚洲大国可以为促进世界公共秩序而精诚合作，

目前，这种合作尚处于初始阶段，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深化我们的这种合作。

显然，这种合作在我们的共同命运更为明显的经济领域更容易实现。然而，政治领域的合作同样重要。如果我们在政治领域的合作能够取得成功，那将会对我们的双边关系产生重大的建设性的影响，两国都将受益于此。眼下日本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在具体环境和特定领域内提供这种合作的实例。

与此相关，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日美安全关系对于促进日中关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日美安全条约存在的基本理由基于以下事实，即在 1952 年日本重新获得独立的时候，日本选择的国家安全方针是，依靠与美国的同盟框架而不是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国家安全。记住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冷战结束后，日美维持同盟的这一基本理论依据的重要性并未下降，特别是在该地区的不稳定因素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相反，同盟作为一种保证日本安全的框架正在获得日本人民更大的支持。

日美同盟正在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以适应东亚地区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对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担负更大责任的期待，这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我们日本人把通过维持亚洲的稳定来保证日本的国家安全视为日美同盟的目标。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日本和美国才想与中国建立确保本地区稳定与繁荣的相互信赖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理解并尊重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这些基本理论依据看来便是至关重要的了，反之亦然。只有在这种真正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持久的友

谊。

结 语

世界现在正处于重大变化之中，我试图将这些变化描述为世界正在迈向新的国际体系。作为世界大国之一，中国被期待着与日本一道为正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世界作出贡献。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正在迈向新的协调型世界秩序的当前环境下，中国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

我诚恳地希望，中国能够认识到她所处的这一客观地位，并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来回应世界的期望。今天我向你们传递的信息

是，意识到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所处地位的中国年轻一代应该对世界正在面临的挑战作出回应。作为世界上的一个伟大国家，中国能够超越其传统的单纯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国从如何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这一更广阔的视点来考虑中国能为世界做些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勿需赘言，上述建议也完全适用于日本。日本同样也决不能只单纯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是必须竭尽所能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我们日中两国能够发现共同的奋斗目标。

（于铁军 译，袁明 校）

科研简讯

我院和北京电视台联合拍摄电视专题片《海峡风云》 获社会热烈反响

在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两岸关系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问题的时候，我院和北京电视台联合拍摄了七集电视专题片《海峡风云》。该片由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陈云林任总顾问，罗青长、杨斯德、经叔平、郑鸿业、贾亦斌、张铭清、梁守德、方连庆任顾问。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为该片题写了片名。我院常务副院长潘国华教授为该片总监制，我院国政系主任李义虎教授为该片总策划。

《海峡风云》共分七集：千秋大业、一脉相承、两岸交流、分裂逆流、国际角逐、台海危机、统一大势。我院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该片的撰稿工作。

《海峡风云》一片是国内学术界和电视工作者进行合作的有益尝试，是集学术资源和影视资源于一体的可贵努力。该片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政治性、艺术性和可视性，其中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镜头和资料。该片于3月下旬由北京电视台一台黄金时段播出，并由北京电视台三台重播。自播出以来，该片获得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受到有关部门和报刊的高度评价，评论说它是自台湾选举结束的第一部反映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力作。国台办、北京市台办、空军、海军和有关高校都对该片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给予了高度肯定。

5月中旬，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海峡风云》电视专题片播映座谈会，该片VCD同时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 政）